

后 记

笔者纯属历史学业余爱好者，受外婆、父母的嘱咐，探寻先祖郑开文的过往足迹，查阅那些已经风云流散的情事。原想这至多不过是关于一个人的传记或是一部家族史，不曾想，随着调查的深入，却发掘到郑开文参加辛亥革命的重大题材。有幸近距离观察到先祖郑开文在这场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中，率部参加攻克南京之战，为推翻清王朝而浴血战斗，为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民国肇立，在外部势力试图侵略、瓜分中国疆域的关键时刻，他不计个人安危，率部援藏援疆，挺身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护国战争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复辟活动，积极谋划、参与护国战争，运用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促成了广东的独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和护国军军务院的成立，为护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处于低潮的关键时刻，他满怀激情地拥护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秉持革命军人的立场，坚守初心，布局明天，挺身奋战在抗拒桂系军阀妄图吞并驻粤滇军的风口浪尖上，从而成为孙中山先生再次集结革命军事力量，驱逐桂系军阀出粤、出桂，以及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事件的导火索，其作用和影响堪称石破天惊，建树了重要的历史功勋。

先祖郑开文的人生经历是一部精湛的教科书，它的每一页，都记载着令我们震撼和感动的大无畏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以及矢志不渝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后辈诸人自强不息的宝贵财富，也是鼓舞我们在当今社会里修身、治家、立业的强大动力。

在艰难的追寻历史资料和写作过程中，为了跳出他人叙事的框架，真实地反映辛亥名将、民国要人郑开文的重大功绩和历史贡献这一目标，搜集与考证史料，是最基础的工作，不得不尽力为之，并希冀所得材料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虽有前人留存有一些资料，但是，那些不明就里的作者所编撰的故事或口述历史，往往经不起一番追根溯源的考据，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极少有直接史料、官方记载，以及事件亲历者或接近事件发生地、发生时间的记载依据。因此，本书所转载的档案材料、实物、文录，特别是涉及郑开文个人的行踪事迹，都是第一次面呈读者的，缄默不语不妥，语焉不详更会引起争论。所以，详细论证是必不可少的过程，所有关于郑开文的历史材料，没有取用某某权威书载、先人传说或未经验证的材料，均以笔者根据郑开文直系亲属所提供的线索，经多方努力，以查阅到的档案材料或取得实物材料为依据，并与间接史料、民间记载、国外记载、事件亲历者或傍涉接近事件发生地、发生时间的记载进行比较验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有一说一，实话实说，不作演绎，不敢取巧，稍有议论、评论，但没有妄言结论。并且所有引用资料，均笨拙、费力地标注资料的出处以及提供资料的机构或个人，方便读者、研究者查询。

郑开文的故事不乏曲折离奇的情节。我们曾经设想，如果将其写得跌宕起伏、绘声绘色，或许有不错的观赏效果，像有的影视作品那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郑开文参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经历是相当隐秘的，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的许多关键时刻，均有重大建树，需要当

今人们的重新认识，需要客观、准确的记录。有鉴于此，我们明确了一个原则，不虚构任何故事，不添加任何情节，用事实说话，用可靠的第一手史料说话。这种做法，符合笔者之一是个理科男的职业习惯。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类似，任何学术的科研成果都可以在现实条件下重复或被认知，才可能被科学界所认可，而不是其他。此书的写作，与其说是采用人物传记的文学笔法，倒不如说更多地采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有如物理公式由此及彼的推导过程，其中数量关系和内在逻辑是不能人为添加或者假设的。所以，本书所写的内容，力求做到有事实依据，有来源出处，不捕风捉影，不随意演绎，力求细节真实，依据可溯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追寻先祖郑开文的历史遗迹和写作过程中发现，以往流传甚广的一些说法，已形成相当广泛的影响。由于这些事件与本书主人翁关系较大，实在很难避开，为探明真相，笔者不得不作正面的质疑和辨析。所引用的函电文牒、文物遗存，无疑与以往人们熟知的书籍文章中所阐述的内容有冲突的地方，所涉及的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和人物的心历路程，也不尽然是当今专家学者所断言的结论。

如1906年10月，《云南》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这无疑是云南人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思想觉悟之先导，具有云南民族民主革命奠基性作用的重大事件。其筹划创办过程的记载，史学界一直都以当事人之一李根源先生在1958年出版发行的《云南杂志选辑》序言中的回忆叙述为蓝本，演绎为《云南》杂志的创办过程。而笔者依据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刘揆一等人革命活动的记载，以及云南杨振鸿、吕志伊、罗佩金、郑开文、赵仲、刘昌明、刘钟华等人在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的活动迹象，发现与事实大有出入。

又如，发生在民国元年的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史学界一直以赵式铭编著的《西征篇/云南光复纪要》为主要材料，演绎、编写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战事过程，其实，该书有些记述与史实根本不符。通过研究发现这本书的形成过程颇为复杂，“执笔者各自表功，且有互讪而多失实”，

此为主要因素，加上当时军队作战都必须撰写的《日志》亦被人为销毁的意外因素，以及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军事行动的诡秘性，使这次西征滇军的军事行动始终笼罩着厚厚的面纱不为世人所认识。如《西征篇》文章称“殷司令前命李学诗为前卫司令”，“捷闻，殷司令急命学诗乘胜直捣盐井、理塘”等情节，被后世历史学者、爱好者演绎为“前卫司令官李学诗领导了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但是，经过笔者对历史材料和现场遗迹的苦苦寻觅和挖掘，得到以下材料：云南《天南新报》载有多份德钦前线指挥部“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瓛电”，上海《申报》载“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最近发现的德钦县佛山乡溜筒江村东达垭山口的“滇郑开文西征凯旋纪念”摩崖石刻，现存云南省丽江市黑龙潭公园象山脚下，西征滇军于1912年11月25日撤离丽江前夕刻立的《哀乌斯藏辞并序》两块碑刻，由西征滇军主要将领率全体将士署名，以及载于《民元藏事电稿》的相关电文原稿，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西征滇军德钦前线指挥部司令官”是郑开文，前卫司令是李学诗。司令官与司令，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因为《西征篇》以及史学者们撰写相关文章书籍的流传和影响，演绎之说反而成为既定“事实”。不得不说，发生在民国元年间的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已经面目全非了。

再如，1920年前后，云南驻粤滇军是始终支持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开展护法运动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在广州设立“海陆军大元帅府”暨“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及孙中山先生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有主导权的“广州护法军政府”，驻粤滇军都功不可没，而唐继尧、李烈钧、张开儒、郑开文、朱培德等滇军将领对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竟然连《国民党党史》都少有正确记载和正面回应。不能不说，这部分护法运动的历史已被打扮成花枝招展、忸怩作态的村姑了。笔者首次披露的驻粤滇军第三师参谋长崔文藻致唐继尧关于成立元帅府谋划过程的电文、郑开文致电孙中山等军政府各总裁、参议院、众议院，呼吁快速组织正式政府、选举正式总统的电文等，表明驻粤滇军张开儒、崔文藻、郑开文、朱培德等人秉持革命军人的立场，不为桂系军阀政客的诱惑拉拢、排挤打击，坚忍不移地整军经武，发展革命军队的力量，支持护法运动的发展，从而成为孙中山先生重新集结革命力量驱逐桂系军阀政客出粤出桂和重建以孙中山先生为主导的第二期“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重大契机。这无疑补缺了护法运动时期，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创业过程和内心世界，显然超出了原有的研究框架，拓宽并充实了研究内容。

为了增添读者探寻历史真相的乐趣和现场感，笔者引用了部分网络信息资源。如上海市图书馆藏书杜昌丁撰《藏行纪程》一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清实录》《清史稿》、四川省图书馆藏书《刘赞廷藏稿》等，以及民间藏品《滇蜀腾越铁路股票》《戊申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谱》，均不同程度补充了云南民国史材料的不足，相信这符合年轻人的阅读和搜集资料的习惯。还引用了一些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材料。比如，引用郑开文就《催收云南铁路局借款处》所暂时管辖的昆明劝业场的财务收支项目致云南督军公署函《有收获押佃租金及开支杂费各款理合分别造具四柱清册呈请查核》的云南省档案馆档案，篇幅很长，似乎与主题无关，但是细读之后就会发觉，该材料对于当时云南社会、经济活动有多处描述，如：兴文书社、益智书社、启明书社、中华书局、围棋学社、权逸球场、幼孩工场等，以及众多商号店铺的存在。涉及昆明劝业场周围还分布有电影院，城隍庙，美食餐饮一条街、玩耍娱乐设施等，遂形成民国年间昆明人购物、娱乐的中心，这无疑是当时云南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有如《清明上河图》般的纪实作用。

对于笔者来说，困难的倒还不是材料的挖掘和组织，最为艰巨的工作还在于能否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很好地梳理并正确阐述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这段至关重要又异常复杂的历史。限于笔者对中国近代史和对中国社会认识水平的不足，要厘清这段激烈动荡、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历史，以及刻画公众人物在社会动荡过程中复杂的人性张弛，心路历程，深感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学术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坚信读者通过本书提供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已能对民国初年历史尤其是这部分云南民国史的是非得失，做出睿智的明晰。

《曾经大地河山从新整顿——追寻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郑开文的足迹》书稿即将付梓之际，真的要感谢许多人，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光靠笔者夫妇的孤独作战，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要感谢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部研究员彭训厚先生，多次耳提面命予以研究方法和中国近现代军事发展脉络的教诲；每每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都得到先生邮寄图书资料的襄助。特

别是本书初稿在彭先生精心审阅后，提出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为本书稿的精准叙事和准确刻画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等方面，受益良多。

感谢中国海军军事指挥学院军事教育专家党良堂哥，在搜集郑开文在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工作期间的资料方面，以及在组织军事教育方面研究和经验的传授，给予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也是笔者认知中最为短板的知识结构方面的帮助。

感谢有集团军政治工作经验、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亲身参加过“援藏平叛”战事的党树祖大哥，多次亲临指导和提供战争现场见闻，给予我们许多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对本书关于滇川藏区域地貌、风情的描述提供了真实的材料。

感谢北京王玉玲姑姑对本书在选材、撰稿等方面给予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并在编写、审稿等方面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帮助，对本书的顺利出版，贡献尤巨。感谢党广莹、孙钟夫妇，参加了外公郑开文生平事迹材料的辨析梳理以及郑开文参与辛亥革命因果得失的讨论与探索，并在经济上给予了资助。感谢郑氏家族汝字辈老人郑若蘅嬢嬢，她收藏百年的图片资料和深沉的回忆，使我们得以窥见百年前郑氏家族的风貌，帮助笔者回归到历史的现场去追寻先祖功德。感谢表妹马瑞萍、高德魁夫妇，正是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寻觅到非常难得的多份档案资料，为本书的书写提供了扎实的证据材料。还要感谢北京卢大成、王静夫妇，卢迦英表妹，为笔者在京收集资料给予了热情接待和照顾，在帮助我们联络军事教育专家、学者、专业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使我们受益颇多。感谢上海世纪联华沙国强夫妇、侄女沙国贞夫妇在帮助搜集资料和生活方面给予的资助。

感谢云南省档案馆工作人员，对本书档案资料的收集和利用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感谢云南省图书馆杨萍女士，正是她和她的同事们的辛勤工作，帮助笔者获得许多珍贵的图书资料和图书出版方面的信息。

非常感谢所有关心作者的亲朋好友，他们在道义和情感方面的默默支持，是笔者能坚持完成书稿撰写的巨大动力。要感谢的人很多，对于提供图书资料、档案史料的各位同仁，均在引用的文档图片中俱列其名，以致谢忱，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写作本书可以说是为了重新认识一个被人们遗忘、被曲解的民国将领、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校长郑开文的生平事迹。但留下的遗憾依然很多，许多材料仍然缺失。如郑开文在南京临时政府工作时期、在广西编练新军时期、在援藏援疆抗击外国侵略等方面，仍然缺乏有足够分量的、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予以证实。收集材料很困难，由于疫情的蔓延，计划中查阅国外档案资料已不能如愿。查阅国内保存的档案资料，其实也非易事，即便是一些已知的线索，由于条件的限制，也不能事事如意。因此，有关郑开文的一些经历，笔者可能只是窥见一斑，书中还留有一些疑点和模糊之处。在新材料发现之前，只能暂时留白，暂时存疑，期望得到读者的谅解，并恳望得到专家学者和读者的赐教和意见，如果机会成熟，条件允许，我们当会继续努力寻找史料，争取有所弥补。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的潮起潮落，个人生命的花开花谢，亦如江水默默地流淌，偶遇

急流险滩，也会有风生浪起的时候。先祖郑开文的人生有幸，在中华民族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口，为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尝试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乘着风云际会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进步、人民福祉作出了应有贡献，并以他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历程回报了养育他的中华民族。今天，郑开文后辈诸人生活在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辈人的努力中继往开来。饮水思源，纳凉忆种树，安能不追思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开创之勋绩！

笔者深感荣幸的是，在此次探幽揽胜的追寻过程中，能够与我的先辈们相遇，有机会献上我们谦卑的同情和敬意。为他们在坎坷时代付出的牺牲而痛惜，更为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所做的奉献而赞叹。正是循着一页页发黄的、记录着他们无私奉献和浴血奋斗的史料碎片，整整一百年后，才有了一段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阅读、写作经历。并且不揣业余者的浅陋，期望用人物传记这样一种形式，记述先辈们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所经历的探索与迷惘、失败与痛苦、梦想与光荣。这种感觉太好，憧憬满满，因此必须要说声：感谢所有的过去和现在；感谢所有的偶然和必然；感谢生命中与您相遇！

党广源 沙光耀

2023年6月于源霖山庄